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冯绍雷 徐凤林 主编

В. В. 津科夫斯基 (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著

徐文静 译 徐凤林 校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上海三联书店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冯绍雷 徐凤林 主编

В. В. 津科夫斯基 (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著

徐文静 译 徐凤林 校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俄罗斯]B. B. 津科夫斯基著;徐文静译,
徐凤林校.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5

(俄罗斯人文社科经典译丛)

ISBN 978-7-5426-5129-7

I. ①俄… II. ①津… ②徐… ③徐… III. ①思想家—
思想评论—俄国 IV. ①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6188 号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著 者 / [俄罗斯]B. B. 津科夫斯基

译 者 / 徐文静

审 校 / 徐凤林

责任编辑 / 邱 红

特约编辑 / 张桂娜

装帧设计 / 周周设计局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129-7/B·402

定 价 / 42.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目 录 | ОФЛАВЛЕНИЕ

中译本导言 / 005

编者前言 / 017

第一版序言选 / 025

再版序言 / 027

第一章

历史导言。19 世纪第一个 25 年 / 029

第二章

И. В. 果戈理 / 053

第三章

斯拉夫派 / 069

第四章

А. И. 赫尔岑 / 091



第五章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И. С. 阿克萨科夫和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 / 107

第六章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欧亚主义者 / 127

第七章

Н. Н. 斯特拉霍夫。Л. Н. 托尔斯泰。Н. К. 米哈伊洛夫斯基 / 145

第八章

В. В. 罗赞诺夫。В. Ф. 埃恩 / 169

第九章

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Н. А. 别尔嘉耶夫 / 189

结语 / 223

注释 / 229

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名著译丛

冯绍雷 徐凤林 主编

В. В. 津科夫斯基 (В. 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 著

徐文静 译 徐凤林 校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РУС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И ЕВРОПА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为华东师范大学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项目成果

目 录 | ОФЛАВЛЕНИЕ

中译本导言 / 005

编者前言 / 017

第一版序言选 / 025

再版序言 / 027

第一章

历史导言。19 世纪第一个 25 年 / 029

第二章

Н. В. 果戈理 / 053

第三章

斯拉夫派 / 069

第四章

А. И. 赫尔岑 / 091



第五章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И. С. 阿克萨科夫和 Н. Я. 丹尼列夫斯基 / 107

第六章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欧亚主义者 / 127

第七章

Н. Н. 斯特拉霍夫。Л. Н. 托尔斯泰。Н. К. 米哈伊洛夫斯基 / 145

第八章

В. В. 罗赞诺夫。В. Ф. 埃恩 / 169

第九章

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Н. А. 别尔嘉耶夫 / 189

结语 / 223

注释 / 229

中译本导言

俄国思想家批判西方文化的两种立场

徐凤林

“俄国与西方”问题是贯穿于俄罗斯思想史的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尤其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在俄国 19 世纪中后期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论战中。这一问题是在西方与俄国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和展开的。18 世纪的俄国“所有人都是西方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因为西方有两种东西都成为符合俄国知识分子生命理想的榜样，一方面是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对个性自由和平等正义的关注与追求，对人的理性的信仰，对有可能在理性原则基础上改造生活的信仰。这是俄国启蒙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精神追求，在人间实现上帝理想，道德纯洁性与社会神圣性。这就是俄国共济会的思想宗旨。但这种单向的“西化”思潮为什么转变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双向对峙？为什么会出现斯拉夫派对西方（欧洲）的批判？我们可以找出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西方自己出了问题，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动荡造成了许多不良社会现象，使俄国知识分子对上述启蒙理念的信仰发生动摇；二是俄国与西方国家的战争所激发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俄国的胜利（拿破仑战争）激发了民族自豪与自信，俄国的失败（俄土战争）则激发了



爱国热情；三是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贬低本国历史文化的偏激观点，招致了斯拉夫派的反感和批判。

总结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可以划分出两种不同立场的批判，一是站在一般文化哲学立场上的批判，一是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批判。前者在根本上以文化普世主义为前提，后者则主要以文明冲突论为出发点。

一般文化哲学立场的批判以老一辈斯拉夫主义者为主要代表。这类批判有两个特点，第一，这类批判已不同于先前某些俄国思想家对欧洲某个国家的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和指责，这种指责（如冯维辛）具有偶然性、个别性、零散性和表面性。而 19 世纪 40 年代形成的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已具有了自己的文化哲学观念和立场，这就是民族意识与东正教真理的结合，由此形成了他们以基督教哲学为基础的文化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他们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展开了对欧洲的批判。第二，老斯拉夫主义者的批判不是以反对西方为出发点的。如津科夫斯基所说：“在斯拉夫派身上，他们没有感受到对西方的仇恨或是对西方强烈的敌意，甚至可以说，斯拉夫派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反西方论者……他们在谈到西方的危机时不是带有敌意，也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试图揭示其危机的原因，为了避免西方的错误。”（参见本书第 077 页，以下只标页码）

一、一般文化哲学的立场

什么是文化哲学？简单地说，就是从哲学的观点和角度来反思文化。因此，这首先不同于从某种具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观点或运用其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及其历史；其次，文化哲学也不同于文化学。文化学把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分类和系统化（如划分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社会文化、工艺文化等),探究文化史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等。文化哲学则探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精神基础,文化与人的生命、人的自由的关系、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因此,早期斯拉夫主义者(如霍米亚科夫、伊·基列耶夫斯基、康·阿克萨科夫等)的文化哲学立场,是侧重从人的精神生活、人的完整生命角度来评价西欧国家的政治制度、道德法律和社会生活。他们坚持生命完整性、社会有机性的原则,主张人生与社会应当建立在信仰基础上,批判西方的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

俄国思想家批评西方社会制度缺乏信仰的基础,认为这是由于西方对理性的崇拜造成的。他们的批评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却没有具体的社会政治纲领,不关心如何解决国家政权与人民的法律关系的现实问题。《莫斯科公报》的撰稿人之一 B. П. 季托夫在致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信(1836年)中写道:“欧洲的信仰是不完整的、冷酷的、不坚定的。欧洲社会制度建立在公民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基础上。”(第 042—043 页)果戈理在自己的著作中说:“理性对于当代人而言,就是圣物:它怀疑一切——怀疑心灵,怀疑上帝——但就是不怀疑理性自身……令人惊讶的是:当人们已经开始思考,用教育把仇恨从世界中驱赶走时,仇恨则从另外一端、通过另一条道路进入世界——也就是理性的道路。”(第 065—066 页)伊万·基列耶夫斯基认为:“许多个世纪的冷漠分析破坏了欧洲文明从自身发展的起初就建立在其上的所有的那些原则,……而成为其直接财富的是最损坏其根的分析、是这个理性的剃刀、是这个抽象的三段论,以及这个除了自己和个人经验以外不承认任何事物的独裁知性”(第 080 页);“从知识的全部总和中得出的普遍结论尽管拥有其全部财富,可以说,尽管它在科学中取得巨大的个别发现和成就,但它对人的内在意识而言却只有否定意义”(第 081 页)。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指出:“在西方,精神在衰退,被国家体制的改良和警察局的完善



所取代,同时,良心被法律取代,内心动机被条例取代,甚至慈善事业也变为机械的事情:在西方只关心国家体制。”(第 079 页)

没有信仰前提的理性主义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道德基础的丧失,导致虚无主义,造成西方社会的悲剧。按照伊·阿克萨科夫的分析,“在西方,革命的虚无主义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可有可无的现象,它的根在历史和西方文明的本身之中……它是由西方培植出的文化之树上的果实”(第 115 页);“布道者、领袖和鼓动者以及大部分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家——他们即便不是欧洲教育的精英,也是一群学识渊博的人——他们无疑是西欧的先进思想家……这一切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思想,并且无疑是高尚的思想。是的,这就是自由、仁爱、公正、所有物质财富平均分配以及普遍平等的思想。那么如此高尚的、道德的思想怎么就制造出非常不道德的事业了呢? 19 世纪引以为豪的一切思想怎么就曾经并且现在还在为残杀、破坏、暴力的胜利以及倒退服务呢? 的确,这些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是怎样一群人呢? 这是一群靠科学和文化武装起来的新型的野蛮人,是一群打着诚实和正义名号的骗子,是争取仁爱的野兽,是追求进步的强盗和宣讲天堂的魔鬼……当代所呈现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景象呢? 自由变为专制,平等变为对个性最神圣权利的践踏,公正变为充满恶意的谎言,知识变为不学无术,智慧变为愚蠢”(第 115—116 页)。阿克萨科夫沉痛思考为什么在文明的体现者那里隐藏着如此之多的恶,其根源不在文明自身,而在于缺乏信仰:“恶不在科学中,当然,也不在文明中,而在他们对自身的信仰当中,这一信仰摒弃了对上帝和神圣道德律的信仰……因为……文明和知识自身不能保证使人类脱离野蛮和残暴。”(第 117 页)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就处于这种无信仰之中。“在西方现代学说的深处,不仅是西方革命学说,而且还有哲学学说,总而言之,在西方‘最高成就’的深处,都以对上帝的拒斥为基础,因此也就拒斥了一

切使人神圣化和使与人相连的全部自然神圣化的事物……人就变得空虚、被肉体所奴役……就会产生像崇拜上帝那样崇拜无灵性的物质和失去神圣性之人。”(第 116 页)

自由精神是斯拉夫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东正教信仰、生命完整性基础上的,因此这种自由是与统一性相一致的(霍米亚科夫的“聚和性”思想),是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不相容的。“斯拉夫派在坚定而顽强地捍卫个人生活中的自由的同时,也与个性的‘隔绝’及其孤立进行着斗争,这一孤立放大并夸大了个性的力量,使之自我封闭,并注定以自负和高傲告终。对于具有深刻宗教意识的斯拉夫派而言,谦卑是个性兴盛和生长的条件——由此也为理解基督教的东方和基督教的西方之间的一种最深刻的精神差别开辟了前景。”(第 081—082 页)然而在西方,个性的发展是与纯粹理性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导致了“个性的兴盛在西方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孤立的个性与所有人的分离”。萨马林认为,把个性观念置于弃绝私欲之外,是西方的原则,是脱离了基督教的原则,因为在基督教中个性的解放与弃绝私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性的片面发展是欧洲个人主义的内容,个人主义的虚弱和软弱无力如今在西方也被人们所承认(第 082 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现代欧洲文化在自由问题上的困惑与迷茫,以及这种“自由的混乱”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后果。“这种混乱是由于欧洲人类远离基督而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精神生活的整个前景被歪曲和改变了,道德生活的基础本身发生了动摇——而欧洲人只留下了不结果实的和软弱无力的自由。由此产生了所有这些疯狂的暴动,人身上罪恶原则的暴露,——由此也产生了欧洲文化在应付这一它所产生的困难上的完全的无能为力。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不死——而当代欧洲文化就站在这一立场上——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人类意志没有任何界限,也就没有了‘犯罪’本身。



欧洲意识从两个极端得出了这一可怕的结论。科学世界观否定自由意志，确认没有‘犯罪’本身，也没有‘罪孽’，‘有的只是饥饿的人们’。对自由意志的否定使人身上的道德过程变为不可能的和不需要的。而欧洲意识的另一个流派（即否定基督，忘记上帝）也走向同样的结果，即走向人的道德力量的瓦解。最深的非道德主义——这是欧洲文化的结果——已经不能摆脱，也无法隐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惧怕窥视人类心灵的这一黑暗可怕的深处——在这一心灵的深处他看到了彻底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囿于一己和对他人的博爱态度的消失。”（第 200 页）

20 世纪俄国哲学家埃恩（1882—1917 年）从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划分出发批判西方文明。在他看来，文化是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相联系的，文明则是与外部生活形式相联系的。“没有什么比文明更加与文化相敌对了。文明是文化的反面。文化创作只能用来感染人……而文明是在机械地传递。它不能用来感染人——而只能用来灌输人。文明是被物化的理性主义……与作为自有永有者的自然的脱离，是理性主义的基础，这种脱离作为隐秘而神奇的分离力量进入到了文明的每一个产物中……众多部落和民族由于与欧洲文明的外部交往而正在消亡……文化状况由于文明的增长与进步而变为悲剧性的。理性主义在到处使温柔的、鲜活的、充满本体魅力的文化之花淹没在这样一些纸质的死的花海中，这些纸花是由一些精神空虚的人在没有生命的机器上制造出来的。”（第 185 页）关于西方文明，埃恩在《简论逻各斯、俄国哲学与科学性》（1911 年）一文中写道：“我否定‘西方’的不是生活，不是历史，不是伟大的文化成就，而仅仅是理性主义，和在我看来是反文化的原则。理性主义与机械论观点相联系，而后者养育着技术工业，并在更大程度上养育着脱离了生存的宇宙条件的、机械式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文化在整个世界（也包括俄国）都受到极大的威胁。文化被物质文明的进步所吞没。西方生

活和俄国一样没有获得正常的发展,而是陷入了日趋加大的危机,陷入了日益扩大的混乱。我不相信混乱会最终胜利,但我认为,世界上的文化的状况不能再引起任何幻想了……我承认西方文化的所有……顶峰,但是完全否认那一折中的、腐朽的和正在瓦解的文明,(在俄国也有很多!)我深信,这一文明是理性主义合法和必然的产物。”(同上)

当俄国思想家站在一般文化哲学的立场批评西方文化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根本上否定西方文化本身,而是为了捍卫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为了同西方派力图将西方的风俗、观念和生活方式盲目引进俄国的做法进行斗争。这既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一般近现代文化的批判和反省。他们一方面相信俄罗斯文化具有特殊的世界历史使命,但另一方面仍然具有文化普世主义精神,虽然是一种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普世主义。这使得俄国思想家对欧洲的一般文化哲学立场的批判不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批判。

二、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

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之后,俄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在俄国思想界进一步尖锐化,反西方思潮显著加强。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战争使俄国人再次意识到俄国与欧洲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差异和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发生的革命与社会动荡使俄国主要社会思潮进一步相信“俄国可以走不同于欧洲的另一条道路,可以向世界彰显出新的社会制度,避开让当代欧洲窒息的所有困难”(第169页)。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突出表现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其出发点已不是俄国与西方的和解,不是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综合,而是俄国与西方的分离。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也就是文化多元论的立场,文明冲突论的立场。



伊·阿克萨科夫先前并不拒绝共同人类文化的观念，也不拒绝全人类历史的根本统一性。他曾写道：“西欧文化——是全人类的财富，更何况它不是一个西方所创造的……西欧文化接受了古希腊的全部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全部理智和精神财富，以及来自东方的基督信仰之光；西欧文化——是世界历史文明道路的一个阶段，因而这一阶段是我们不可能绕过的”（第 114—115 页）。但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反西方的思想在他身上不断加强，使他对西方的批判具有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对抗的性质。他在 1861 年写道：“已到了这样的时候，也就是应该明白：西方对斯拉夫东正教世界的仇恨，并且常常是本能性的仇恨，源于一些极其隐蔽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两个相反文明原则的对立，是旧世界对有着发展前途的新世界的妒忌。也到了我们最终接受挑战并为了自己和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们勇敢地投身于与欧洲政论进行战斗的时候了。”（第 112 页）几年后，他又写道：“欧洲的全部任务曾经并且现在仍旧在于，制止俄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增强，防止产生这样一个新的东正教-斯拉夫世界，它以俄国为旗帜，仇视拉丁-日耳曼世界。”（第 112—113 页）他在 1881 年的一段话更加鲜明而激烈，他写道：“在文明的西方，自古以来就建立了双重真理：一种是为他们自己、为日耳曼-罗曼民族，或者说精神上倾向于他们的人建立的，而另一种是为我们和斯拉夫人建立的。所有的西欧强国，只要是在对待我们和斯拉夫人的事情上，就是彼此团结一致的。仁爱、文明和基督教——所有这一切在西欧对东方正教世界的关系方面都被废止了。”（第 113 页）这些表述几乎与一百多年后国际政治学说中的“西方双重标准论”毫无差别。

丹尼列夫斯基以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及其对历史内在统一性的否定而成为俄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对欧洲文化的批判不是针对欧洲文化的结构和基础本身，不是揭露和分析欧洲文化的矛盾性、其薄弱之处及其